

目 录

| | |
|--------------------------------------|----|
| 导言 | 1 |
| 第一章 民族名称和民族来源 | 6 |
| 第一节 民族名称 | 6 |
| 第二节 民族来源 | 9 |
| 第二章 原始社会的基本面貌 | 18 |
| 第一节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 18 |
| 第二节 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 26 |
| 第三章 原始社会的逐步瓦解和封建制的出现 | 32 |
| 第一节 中原封建势力进入海南岛 | 32 |
| 第二节 十世纪至十四世纪封建影响的加深 | 41 |
| 第四章 封建制度在广大黎族地区的确立及其 进一步的发展 | 58 |
| 第一节 明代封建制度在广大黎族地区的确立 | 58 |
| 第二节 清代封建制度在黎族地区的 进一步发展 | 70 |
| 第五章 近代黎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 81 |
| 第一节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 | 81 |
| 第二节 黎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 88 |
| 第六章 文学艺术和生活习俗 | 98 |
| 第一节 文学艺术 | 98 |

| | | |
|-----------------|--------------------------------|------------|
| 第二节 | 生活习俗..... | 108 |
| 第七章 |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黎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 109 |
| 第一节 | 陵水地区农民运动的兴起..... | 109 |
| 第二节 | 土地革命和红色政权的建立..... | 113 |
| 第三节 | 抗日战争和黎族人民的白沙起义..... | 123 |
| 第四节 | 黎族人民和海南岛各族人民的解放..... | 137 |
| 附录： | 原始公社制的残余——合亩制..... | 149 |
| | 大事年表..... | 183 |
| | 主要引用书目..... | 194 |
| 后记 | | 198 |

导 言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锦绣河山里，海南岛象一颗灿烂的明珠，闪耀在浩瀚的南海碧波上。这个面积三万多平方公里、仅次于台湾的祖国第二大岛，是一个得天独厚、美丽富饶的宝岛。从远古以来，勤劳勇敢的黎族人民就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他们和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事业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黎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据一九七八年统计，黎族人口共有六十八万余人，约占海南岛全岛总人口五百二十八万的12.9%，其中约有六十三万人（占黎族总人口的93%）聚居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包括乐东、东方、保亭、琼中、白沙、陵水、昌江、崖县等八县和通什镇）境内，约占全州总人口一百七十五万的36%；其余分布在万宁、儋县、屯昌、澄迈、琼海、定安等县的部分地区，和汉族人民杂居一起。

黎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与广西的壮族和侗族的语言比较接近。不同的地区存在着方言的差别。由于黎族在历史上与汉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黎语的发展受到汉语很大的影响。在接近汉族的地区和各民族杂居区，黎族群众一般都能讲汉语（海南方言）；而且在黎语中也吸收

了不少汉语的词汇，尤其是在解放后吸收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词汇更多。过去黎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均使用汉文。一九五七年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创制了一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黎文。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海南岛的中南部，处于东经 $108^{\circ}37'$ — $110^{\circ}9'$ ，北纬 $18^{\circ}9'$ — $19^{\circ}30'$ 之间。东南滨海与西沙群岛相望，东接万宁县和琼海县，北靠儋县、澄迈和屯昌等县，西南隔北部湾是印度支那半岛的越南。黎族分布在自治州全境，最南到达崖县南部海边的鹿回头村（北纬 $18^{\circ}9'$ ）。黎族地区位于祖国南疆的重要地理位置上，既可控制我国南部沿海的交通，又扼两广的咽喉，在国防和经济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自治州总面积共有一万七千九百多平方公里，占海南岛总面积的一半稍多。全境以海拔一百米以上的丘陵和五百米以上的山地为主，丘陵和山地约占全州总面积的80%。境内丘陵起伏，群山耸立，千米以上的山峰就有八十一座。著名的五指山有如五指插入云霄，巍峨壮丽，高达一千八百多米，是广东省第二高峰，也是海南岛的主峰，自古以来各民族间流传着许多赞颂它的诗歌和神话故事。在群山之中，散布着大小不一的丘陵性盆地和河谷阶地，著名的如通什盆地、营根盆地、东方盆地、白沙盆地、乐东盆地等等，只有东南部、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延展着较宽广的冲积平原。黎族的村庄就散布在这些盆地、河谷和海滨平原之上。

海南岛的地势中间高四周低，岛内各大河流如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等均发源于自治州的五指山区，形成了由许多独流入海的河流组成的放射状水系。黎族地区的河流由于河谷狭

窄，滩多流急，不便于航运，但流量丰富（如万泉河的相对流量相当于长江的四倍），蕴藏着丰富的水利资源，有利于农田灌溉和水力发电（仅昌化江就可供发电三十二万千瓦）。

解放前，黎族地区的交通非常不便，“逢山无路，遇水无桥。”解放后海、陆、空交通迅猛发展。自治州境内已有公路三千七百多公里，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二十七倍，铁路通车里程达二百多公里。境内的八所港和三亚港，与海口港并称海南岛的三大港口，分别有航线通往环岛各港口和广州、湛江、北海等地。从海口空运可通首都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过去“鸟飞犹是半年程”（李德裕诗）的“蛮烟之地”，如今已是朝发夕至，大大密切了黎族人民和祖国心脏地区的联系。

黎族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和亚热带，高温多雨，长夏无冬，风景秀丽，四季繁花似锦。自治州年平均温度为摄氏 24° 左右，年平均雨量达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毫米。温暖的气候和充沛的雨量，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在南部地区年可三熟，玉米、番薯等终年都可种植。在丘陵和山区，有大片宜牧的草地和可供开垦的荒地，不仅是发展畜牧业的理想地方，而且可按不同的环境特点种植橡胶、油棕、腰果、香茅、剑麻、金鸡纳、胡椒、咖啡、可可等热带作物。此外，还出产椰子、菠萝、香蕉、荔枝、龙眼、芒果、菠萝蜜等佳果。黎族地区丰富的热量资源使这里成为我国最大的天然温室，也是全国各地育种专业队伍冬季前来培育繁殖良种的天然场所。

黎族地区矿藏资源丰富。主要矿产有铁、锡、水晶、磷等。自治州境内的石碌铁矿，平均品位为58%，质量之佳可与

著名的大冶铁矿比美。电子工业的重要原料水晶，已发现矿点达两百个以上。此外，还有铜、钴、锰、钨、锌、铅等等。在沿海的沙滩，蕴藏着丰富的钛铁矿、金红石、锆英石、独居石等贵重稀有金属矿物，这些都是宇宙航行、原子能等尖端科学和国防工业的重要原料。在沿海大陆架，据初步勘查，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

五指山区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森林面积达一百七十多万亩，占海南岛森林总面积的70%，木材总蓄积量达一千万立方米。广东四大原始森林，有三个——吊罗山、尖峰岭、霸王岭就在自治州境内。这里以出产珍贵热带木材而闻名全国，是我国造船工业用材的一个重要来源地。适合于制造名贵家具和造船的热带木材达一百多种，其中如波垒、母生、子京、花梨、青梅、绿楠、胭脂、石梓等等，都是工业、家具、工艺美术的特级木材。此外，山区还盛产竹子、红藤、白藤、茶叶和各种野生药材如益智、杜仲、巴戟、良羌等，尤以海南沉香最为珍贵，历史上素负盛名。森林里珍奇的野生动物种类繁多，有些还是特有的种属，如灵长目的黑冠长臂猿，是类人猿在国内仅有的代表；狐蝠、坡鹿、孔雀雉和热带种类的巨蜥、飞蜥，在我国仅见于五指山区。此外，还有熊、云豹、赤麂、水鹿、鸚鹑、太阳鸟、原鸡、海南了哥等，都是有着一定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黎族地区不愧为我国珍贵的热带动物宝藏。

黎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传统。早在三千多年以前，黎族人民的祖先披荆斩棘辛勤地开发了祖国的南疆。宋元时代，黎族先进的棉纺织技术，精美华丽的黎锦、黎单，就为人们所称颂而名噪一时。明清以来，黎族人民精心培育的优良

农作物品种，更是远近驰名，深受喜爱。黎族的民间文学艺术，源远流长，不仅绚丽多彩，而且富有独特的民族风格，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珍贵的一部分。

黎族人民以自己的光荣革命斗争历史而感到自豪。在解放前漫长的苦难日子里，为反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黎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起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黎族人民就积极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斗争行列，在创建海南岛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陵水县苏维埃，建立五指山革命根据地，以至解放整个海南岛的历次重大革命斗争中，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解放后，黎族人民又和人民解放军一起，捍卫着祖国的南大门，为保卫和巩固祖国的国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建立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成立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一九五五年改为自治州），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各族人民充分享受着民族平等和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各民族间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逐步形成和发展。今天，黎族人民正和祖国各族人民一道，在党中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满怀信心地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勇前进！

第一章 民族名称和民族来源

第一节 民族名称

黎族内部过去由于分布地域不同和方言、服饰等差别而形成不同的支系，因而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称呼，如ha³（汉译为“俸”）、ha³ʔe:m²（“俸炎”或“俸应”）、gei⁴或hei⁴（“杞”或“岐”）、mōi¹-fau¹（“美孚”或“美阜”）、zɯ:n¹（当地汉族称之为“本地黎”）等^①。但黎族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的民族自称，这就是ɬai¹（或作sai，音译近似于“赛”，不同的方言有称为tɬai¹、dai¹、thai⁴的，都是ɬai¹这个音的方言变读）。黎族在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交往时，都自称为ɬai¹，而不叫ha³、gei⁴、mōi¹-fau¹等等，可见ɬai¹是黎族固有的族称。

在我国历代的载籍中，对于海南岛上汉族以外的原住居民有着许多不同的称呼，如西汉时称为“骆越”（《汉书·贾捐之传》），东汉时称为“里”、“蛮”（《后汉书·南蛮传》），隋代则

^① 据调查，称为ha³和ha³ʔe:m²的黎族主要分布在乐东、崖县、陵水、昌江、东方等县的部分地区；称为gei⁴的主要分布在琼中、保亭两县，也有少部分分布在乐东和昌江县；称为zɯ:n¹的主要分布在白沙县的大部分地区；称为mōi¹-fau¹的主要分布在东方、昌江两县的部分地区。

“俚”、“僚”并称（《隋书·谯国夫人传》），唐代亦普遍沿袭这种称呼^①。但是这些名称大都是当时对我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泛称，并不是专指黎族而言。“黎”这一族称最早见于文献上是在唐代后期，如《新唐书·杜佑传》有“朱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的记载，这是唐德宗年间（七八〇至八〇五年）的事。又唐昭宗时（八八九至九〇四年）曾任广州司马的刘恂在他所写的《岭表录异》中，也有“儋（州）、振（州）夷黎海畔采（紫贝）以为货”的记载。但普遍以“黎”代替“俚”、“僚”作为黎族的专用名称则是在十一世纪（宋代）以后。宋代的文献如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苏轼父子谪居海南岛时所作的诗文，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等均有用“黎”的名称。“黎”这一专用族名到宋代才固定下来，一直沿用至今。

至于“里”、“俚”后来为什么改称为“黎”，过去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比较普遍而流传较早的，则认为黎族是因居住的地方称为“黎”或“黎母山”而得名。如《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儋州·风俗》条：“（儋州）俗呼山岭为黎，人居其间，号曰生黎。”《桂海虞衡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海南）岛之中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四旁，号黎人。”到了明代后期，则开始认为“黎”是从古代的“俚”音转化而来的，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四《广东八》：“按俚讹为黎，声之转也久矣。”至清代李调元的《南越笔

^① 道光《琼州府志》：“唐高宗乾封二年（六六七年），岭南洞僚陷琼州，东南诸乡尽没……。”《旧唐书》卷一百十二，列传六十二，《李复传》：“……李复……迁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观察使……琼州久陷于蛮僚中，（李）复累遣使谕之，因奏置琼州都督府以绥抚之。”

记》和檀萃的《说蛮》均持同一意见。清道光《广东通志》卷三百三十《列传·俚户》条则把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认为黎族在后汉时称为“俚人”，“俗呼山岭为黎，而俚居其间，于是讹俚为黎。”

目前，根据对黎语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有些语言学者认为黎族名称的演变，可能与黎族的自称 ɬ ai^1 在不同时代里读音发生了变化有关，即隋代以前可能音似“俚”，到了中古时音近“黎”。现在黎族的自称 ɬ ai^1 ，在比较早的时候可能读成 $1ai$ 、 $1ei$ 等音，这跟中古汉语“黎”字读音很接近（黎语 ɬ ai^1 的韵母与中古汉语“黎”字的读音相近，而声母的 ɬ ，则和壮、傣等语言的 l 有对应关系）。因此，“俚”之所以“讹为黎”，是中古时人们根据当时黎族自称的实际读音而对“俚”字的改正，可见“俚”和“黎”都是黎族自称的音译^①。

也有人认为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未发现黎语各方言中有哪一种方言是称山岭为“黎”的，但是，黎语有称土山为 $1u:i$ （音与“垒”近）^②，这与广西壮语的“土山”叫 doi^1 ，海南岛汉语方言称“黎”为 $1oi$ 的读音相近，而古代黎族多在山上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加上当时他们把山叫作近似“黎”（ doi^1 或 $1oi$ ）的读音，因此把这些人称为 $1oi$ （黎人）是很自然的事。

以上这两种说法都是前人意见的延续和补充。但就“黎”这一汉字本身来说，并无表面命义可考，与古籍上记载的“九黎”也没有什么渊源上的关系。

① 欧阳觉亚：《黎族名称由来小议》，载《民族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二期。

②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第一工作队海南分队编：《黎语调查报告初稿》，一九五七年二月。

第二节 民族来源

关于黎族的族源，过去有着各种不同的见解。建国以来，我国学者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掘以及语言学、民族学等各方面材料，结合前人研究的成果，多数人认为黎族与我国南方操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诸语言的民族，如壮、侗、水、布依、傣等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是从我国古代南方的越族发展而来，与“百越”西方部分的一支——骆越有较密切的关系。

据文献记载，从春秋战国到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在我国东南和南部的沿海地区，广泛地居住着相互间有密切族属关系而又“各有种姓”的越人^①。由于分布地域广阔，部落众多，因而又有“百越”之称。其中居住在长江口东南一带的称于越，分布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的称闽越，以广东中部为中心的称南越，位于广东西南部、广西西部、海南岛以至越南北部的称骆越。这些不同种姓的越人，有着基本相同而又各有一定特色的文化特征。古越人这一地域分布状况，与今天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几何印纹陶为代表的诸文化的地理分布，基本上是符合的。也就是说，几何印纹陶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正是古代越人的活动范围。我国东南和南部沿海地区几何印纹陶发展兴盛时期各类型所表现出的文化面貌上的差异，正是古越族种姓繁多的反映。因此，考古学界多数认为这一考古文化的

^① 《汉书·地理志》：“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越）杂处，各有种姓……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越）地也。”

族属就是古代越族^①。

按《汉书·贾捐之传》记载，西汉时海南岛上的原住居民被称为“骆越之人”。这里所谓“骆越之人”，显然是古百越的一支，这在考古学上也得到证实。解放后在海南全岛以至现今黎族聚居的中心地区，都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根据出土器物所表现的文化性质来考察，它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是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特别是与广西钦州地区、广东湛江地区（包括雷州半岛）发现的原始文化更为近似。如石器方面，以磨光、有肩、有段式的斧、镑比较普遍，大型石铲较多；陶器则包括夹砂粗陶、泥质细陶和印纹硬陶三种陶系，但常见于粤中地区的夔纹硬陶则少见^②。这些情况说明，海南岛上黎族的远古祖先，在原始社会时期与古代越族有着密切的文化以至族源方面的关系。

语言资料的分析，也给我们提供了说明黎族和古代越族存在渊源关系的依据。如古越语与古汉语不同，它在语音上有所谓“发声”的习惯^③，这一语音上的特殊现象，在现代黎语中还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在语法结构方面，古越语与黎语也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如《越绝书》卷八载：“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朱余”是由两个名词结合而成的合成词，

① 参见《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纪要》，《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②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一九六〇年第二期。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南路地区原始文化遗址》，《考古》，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

③ 历史学家曾考订过古越语语音上的一些特点。如对于春秋时的越国一名于越，就认为“于越”是“南夷之言”，“于”是发声，“夷言有此发声”（参看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晋·杜预注《春秋左传》及孔颖达的加注）。

后一名词修饰前一名词。这种名词的修饰语放在被修饰的名词之后的结构方式，正是黎语语法结构上的主要特点，它与汉语的习惯恰好相反。

其次，还可以从黎族语言的系属方面来考察。黎语在系属上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的黎语支，与同一语族的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和水语等有较密切的亲属关系，表现在语音、语法和词汇上都有显著的共同特征，如语音方面，声母比较简单，韵母比较复杂，每一个音节都一定有一个辅音起头的声母，没有真正元音起头的音节；声调和声母的关系比较密切。语法上的共同点是：体现语法关系的语法形式主要表现在词序、语序和虚词的运用上；修饰式的合成名词一般是中心成分在前，修饰成分在后；形容词、修饰名词或量词，一般在名词或量词的后边，助动词在主要动词前边；量词限制比较狭，某些名词只能带某一特定的量词。在基本词汇中，有不少是同源词，如名词中的太阳、水、火、风、雨、猪、狗、皮肤……等，动词中的睡、坐、去……等，形容词的高、低、厚、薄、好……等都是同源词^①。语言的发展往往和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黎语既然和壮侗语族各语言的关系如此密切，由此可以推断黎族与壮、布依、傣、侗、水等民族有着共同的族源；而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为这些民族都与古代的越族有着渊源相承的关系，黎族也是由古代越族中的一支发展而成。

在考察黎族语言系属与族源的关系时，对华南地区某些地

^① 韦庆稳、覃国生：《壮语简志》，民族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七月，第二一至二三页。

名的分析研究，也可帮助我们阐明古代黎族的分布情况以及黎族与其他民族的历史关系。在清初屈大均所写的《广东新语》中，就提到在广东的西南部直到海南岛，有着许多相同的而其他地区比较少见的地名。他说：“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并且指出当时的黎族地区也有这类地名，“黎岐人地名多曰那某、南某、包某、番某……”^①。经近人研究，这些地名都是按壮侗语族各语言的读音，以汉字音译而成。如壮语称稻田为“那”，壮语、黎语均称水和河为“南”（或“浦”），黎语称村庄为“抱”、“包”、“番”，称稻田为“打”……等等。这类地名今天不仅在黎族地区普遍存在，而且在海南岛广大的汉族地区尚有大量保留^②。这些事实说明了黎族远古祖先的分布地域远比今天广阔，而且也可看到他们与古代分布在广东大陆地区的越人、里（俚）人、僚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方面来考察，也可找到许多说明黎族与古越族以至现今壮侗语族各民族有关的事例。如古代越族有所谓“断发文身”、“巢居”的风俗。《水经注》转引晋代王范的《交广春秋》，就曾提到当时海南岛上的原住居民就有“披发文身”的习俗。以后在宋代的文献中，有关黎族妇女文身的记载就更多、更详细了^③。直到解放前，黎族妇女还流行文身的风俗，而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男子也盛行文身。至于“巢居”，宋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土语》条。

② 参考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41年版。

③ 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对黎族妇女的文身风俗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代的《太平寰宇记》就有黎人“巢居”的记载。这里所谓“巢居”，大致是指一种“上住人、下养牲畜”的桩上建筑，文献上又称“麻栏”或“干栏”^①。这种类型的房子，解放前在黎族地区还有保存，在广西的壮族地区也很普遍。在婚姻风俗方面，黎族和广西的壮族、侗族都有妇女出嫁后“不落夫家”的习俗，而黎族的“放寮”（青年男女自由谈爱玩耍），和壮族的“玩公房”、侗族的“坐妹”也有近似的地方。

此外，《汉书·郊祀志》曾提到“粤（越）人信鬼，而以鸡卜”，《史记》也有“越巫鸡卜”的记载^②，可见鸡卜是古代越人的一种占卜方法。这一遗风直到解放前在黎族中还完整地保留着。

在黎族的民间传说中，也有不少与壮侗语族各民族的传说是相同的。如黎族中流传的人类起源的故事，基本上属于“洪水漫天为灾，兄妹结婚”的类型，还有“鱼变美女与穷少年结婚”以及有关“雷公”、“雷神”的故事^③，这些在广西壮侗语族各民族中也普遍流传。

综上所述，不仅可以说明黎族和壮侗语族各民族在族源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也可看到黎族的远古祖先，与古代生活在两广地区的古越人，以至后来的俚人、僚人都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琼州海峡两边古代的文化

① 参见戴裔焯：《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印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版。

② 《汉书·郊祀志》卷五下。《史记》卷十二《孝武帝纪》。

③ 参阅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黎族民间故事选》，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四月。

面貌和发展情况都很相近，这种文化内涵的一致性，充分反映出海南岛远古以来与祖国内地关系密切，而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直受到大陆的强烈影响。从海南岛发现的有段、有肩式的石器多属于磨光的比较进步的类型，其初级型或原始型都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发现^①，可以推断海南岛原始社会文化来源于大陆地区，是大陆古代文化向南扩展的结果。目前由于在海南岛尚未发现比新石器时代中期更早的文化遗址，而且我国南方原始社会延续的时间比中原地区长，发展也较缓慢，因而新石器时代的相对年限也比中原地区晚。海南岛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阻隔等原因更是如此。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初步推断黎族的远古祖先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或更早一些从两广大陆沿海地区（特别可能是从雷州半岛）陆续迁入海南岛，其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殷周之际，距今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②。

关于黎族族源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黎族来源于南洋（指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古代民族，是在远古的时候从南洋迁入海南岛的。过去有人从海南岛发现的新石器其型式与马来亚、越南等地出土的相同，由此推断黎族可能在原始社会时期从南洋一带渡海而来^③。有人从303个黎族人体测量材料的分析比较中，认为一部分黎族在血统上与正马来族

① 参看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铈》，《考古学报》，一九五八年第三期。

② 见《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一文关于遗址年代的推断。

③ 参见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海南岛凤鸣村新石器时代遗迹调查》。一九五一年内部铅印单行本。岑家梧：《广东史前时代的文化》，《广东教育与文化》第二卷第三期，一九五一年一月。

(亦称印度尼西亚族)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更杂有少数南洋群岛各民族(包括矮黑人[negrito])的成分,提出了黎族来源的多源说,并由此推断黎族中的一部分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从海道进入海南岛,与南洋群岛诸民族有显然的关系^①。也有人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传说故事等方面来推断黎族来源于南洋,如德国人史图博(H·Stubel)在《海南岛民族志》(《Die Li-Stämme Der Insel Hainan》)一书中,认为黎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与印度尼西亚的古代马来民族,印度支那大陆各民族有更显著的类似,是经过几次的民族迁徙浪潮,从南方进入海南岛的^②。又刘咸在《海南黎族起源之初步探讨》一文中,提出从黎族的文身、妇女妆饰、口琴、织绣物品等方面所表现的特点,认为黎族的文化系统属于“太平洋四个文化区中的印度尼西亚区”,“与南洋群岛各民族所有者大同小异”,从而推断黎族源出于南洋各民族。这些意见可供进一步研究黎族族源问题的参考。

此外,还有人从黎族内部各支系间有着不同的方言、服饰和风俗习惯等等,进而推断黎族的不同支系有着不同的来源^③。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从解放后获得的大量调查材料足以说明,黎族内部的一致性是主要的,不同支系间的差别仅是次要的、派生的,甚至有些特点还是近代才发展形成的。如黎族内

-
- ① 刘咸:《海南黎族起源之初步探讨》,《西南研究》,第一卷第一号,一九四〇年。
- ② 参见该书《关于黎族移居海南岛及黎族与东南亚其他民族的亲近性问题》一节。
- ③ 史图博在前引书中,认为黎族中的本地黎和南方的美孚、歧、侬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后者的三个族都是经过崖县方面移居到本岛来的,其中以侬黎来得最迟。